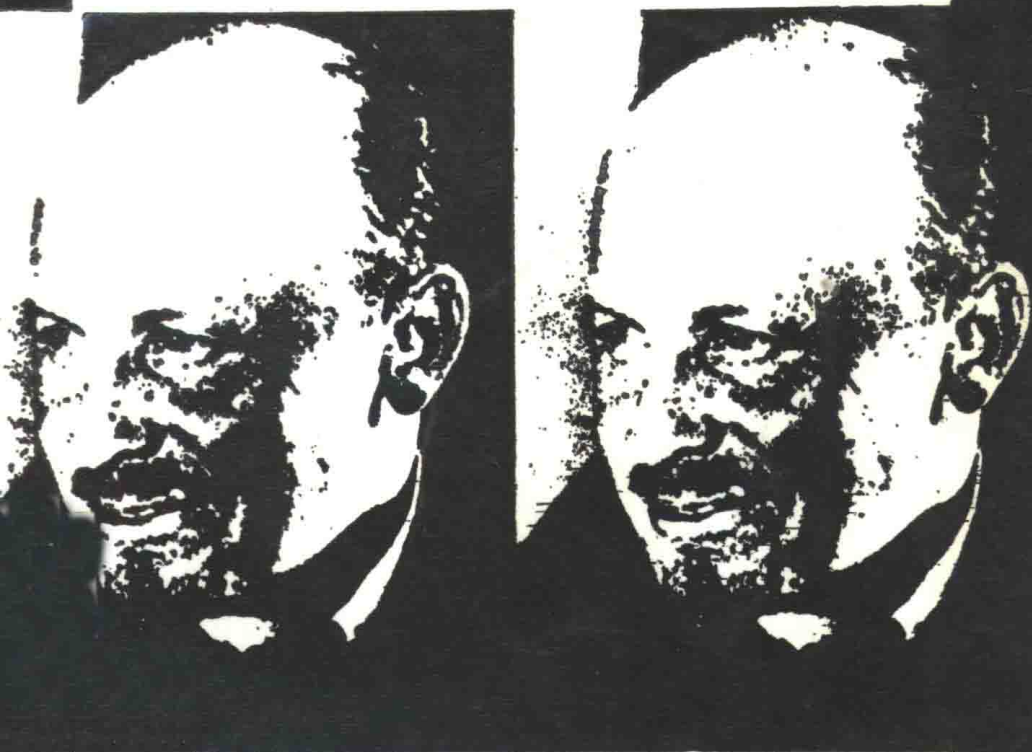


# 布哈林的最后岁月

〔苏〕 罗伊·麦德维杰夫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 布哈林的最后岁月

〔苏〕罗伊·麦德维杰夫 著

段稚荃 张敦厚 译 潘志鸿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Roy A. Medvedev  
**Nikolai Bukharin: the last years**

W. W. Norton & Company, New York. London 1980

根据纽约—伦敦诺顿公司 1980 年版英译本译出

责任编辑：章少红

封面设计：施本铭

**布哈林的最后岁月**

〔苏〕罗伊·麦德维杰夫 著

段稚荃 张敦厚 译 潘志鸿 校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5.5 字数:118000

1988 年 12 月第 1 版 198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000

---

ISBN 7-5012-0142-0/K·24 定价: 1.65 元

##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罗伊·麦德维杰夫是苏联著名的历史学家，1925年生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市，先后任大学教员、莫斯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和苏联教育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所长。他原为苏共党员，1969年因在西方出版著作而被开除党籍，尔后又被解除公职，但仍居住在莫斯科。作为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主要以苏联社会主义史为研究对象。他的主要著作有：《论社会主义民主》、《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等，《布哈林的最后岁月》也是他的一本重要著作。

麦德维杰夫曾经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他的著作不能在苏联出版。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他重新在苏联报刊公开发表文章。他肯定列宁，肯定社会主义，但认为自斯大林掌权以来，苏联的社会主义已不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主张恢复列宁主义的本来面目。《布哈林的最后岁月》一书集中记述了1928—1938年间布哈林同斯大林分歧的发展。书中引用的材料十分丰富，对布哈林的评价也较为客观公正。作者对布哈林寄予深刻的同情，而对斯大林的镇压行为则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作为国际上研究布哈林的著作中影响较大的一书，我们将它翻译出版，以供研究布哈林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参考。

本书原书出版于1980年，其时对布哈林的研究和重新评

价在国际上已有相当规模，但苏联官方尚未为布哈林平反。1988年2月，苏联最高法院主席团取消了1938年3月对布哈林等人的判决。6月，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恢复了布哈林的党籍。为他彻底恢复了名誉。今年恰逢布哈林诞辰100周年和不幸去世50周年，我们谨此向这位杰出人物表达深切的怀念。

1988年6月

## 前 言

布哈林的名字在苏联仍然是被禁止的。即使是最近再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和《苏联历史百科全书》，上面也没有关于布哈林的条目，甚至对他只字未提。然而，我们说起的这个人物，却是布尔什维克最卓越的领导人和理论家之一，一位在革命前很久就理所当然很有名望的人。他是1917年在莫斯科发动十月革命的最杰出的组织者之一。他当过20年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10年的政治局委员。1917至1929年间，主管过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列宁虽然经常同布哈林发生争执，但他从来都承认布哈林是“一位学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的错误主要在于他试图“极力思索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痛苦而艰难的过渡——的具体困难”。列宁在遗嘱中称布哈林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并且，“理所当然地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尽管他们两人之间意见常有分歧，列宁本人对布哈林却给予了特殊的钟爱，简直象对待自己的儿子一般。在列宁卧床不起期间，布哈林与列宁交谈的时间比任何其他人都要多。列宁去世时，列宁的妹妹玛丽亚·乌里杨诺娃决定通知的第一个人就是布哈林。

列宁逝世以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无疑成了党的主要理论家。当时那些被人们称之为“党的总路线”的文件，一向都是布哈林的手笔。他还是斯大林所统率的布尔什维克军队的总参谋长。当时的所谓左翼反对派有时更明确地

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布哈林，而不是斯大林，这是不足为怪的。据说，托洛茨基曾说过：“同斯大林站在一起反对布哈林——是的，那是可能的；同布哈林站在一起去反对斯大林——那决不可能。”

“党内最杰出的理论家”，“最优秀的党的工作者”，“受到我们大家的爱戴并将继续得到我们支持的人”——这些都是奥尔忠尼启则、莫洛托夫、斯大林及其他发言人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评论布哈林的话。几年前，一位非官方的苏联历史学家曾经写道：“在20世纪的革命史中，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的名字可以公正地排在仅次于列宁的位置上。”这个评价虽然未免有些夸张，不过，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符合事实的。

在我国中年一代当中，有一部分人仍然把布哈林的名字同诸如“人民的敌人”，“卖国贼”之类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毕竟，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前的近20年时间里，我国的报刊一直就是这样写他的。可是，二十大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对布哈林几乎毫无所知。他们仅仅知道，布哈林是反对1918年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领袖，而十年之后，同一个布哈林在1928年却变成了反对强制推行集体化和清算富农政策的“右倾”反对派的首领。

在《列宁全集》的人名索引中，尚可找到关于布哈林的一点材料，也是今天的宣传工作者们所需要的最起码的材料。现不妨将这一条解释在此全文引出：

尼·伊·布哈林(1888—1938)：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莫斯科各区担任宣传员。1911年侨居国外。1915年为《共产主义者》杂志撰稿，在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和民族自决权等问题上持非马克思主义

立场。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抛出反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提纲，否定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联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任《真理报》主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多次反对党的列宁主义政策：1918年领导“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党集团；1920—1921年党内工会问题争论期间，先采取“缓冲”立场，后参加托洛茨基集团；1928年起领导党内右翼反对派。1929年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1937年因进行反党活动被开除出党。

本书的目的，不是要批驳这一条的内容和详细叙述布哈林多方面的革命和政治活动。布哈林这个人物在过去十年中，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历史学家的兴趣。在西方于60年代和70年代出版的有关布哈林的观点和他最后命运的书籍当中，可以提出乔治·卡特科夫的研究报告《审讯布哈林》（伦敦，巴茨福德出版社，1969年版）和洛伊的《世界史即世界法庭：评布哈林关于共产主义的幻想》（欧罗巴出版社，维也纳—法兰克福—苏黎世，1969年版）。在1972和1973年，意大利共产党“团结”出版社出版了两大部有关苏联共产党历史的文件集，其中，布哈林的著作占有突出位置（尼·布哈林—普列奥布拉津斯基：《社会主义积累》，罗马，1972年版；以及布哈林、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论“不断革命”和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罗马，1973年版）。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科恩的大部头著作《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政治传记（1888—1938）》（纽约，诺夫出版社，1973年版）无疑是一本关于布哈林的最有价值和最内容的书。一方面，可以说它满足了人们由于对作为革命者、政治家及理论家的布哈林兴趣日益增长而产生的需要；另一方面，它开辟了对他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性，从而更增加了人们的兴趣。

这还没有提到报刊上有关布哈林的大量文章——人所共



知，西方报刊在 1978 年对布哈林展开了特别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一位外国研究者、布哈林选集的编纂者西德尼·海特曼所写的如下一段话，就表明了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对于布哈林其人及其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兴趣：

在列宁的所有继承人当中，只有他，不仅享有一个政治领导人和理论家的巨大权威和影响，而且在领导层和广大党员中深孚众望，……布哈林的个人感染力源于他的坦率、诚恳和正直。尽管他貌不出众，但待人热情，同人合得来，打动了所有认识他的人。他才思敏捷，口才犀利，头脑机智，完全盖过了他那朴素的衣着，缄默的表情，以及时常是超然的神态。他生活俭朴，简直像个修道士一样，他工作时间很长，不注意作息，也不关心物质享受或生活舒适。在 20 年代初，他同第一个妻子分居后，便把睡眠以外的一切时间全都贡献给党并进行无止境的学习。他贪婪地阅读好几种文字的书藉，能以教授的权威来讨论 20 世纪的各种思想体系。他尤其是苏维埃俄国青年们的偶像，他们把他奉为楷模，从他的著作中得到思想鼓舞。20 年代后期，在他出席的无数次会议上，只要他一登上讲台，听众就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和狂热的欢呼，关于他演讲的纪录总是记有在他讲完之后全场欢腾的反应。直到那时，除了列宁（党内外的观察家都常常赞赏地拿布哈林同他比较）以外，党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谁享有过如此深得人心的地位。

与此同时，在托洛茨基失败后的那些年里，布哈林还在共产主义世界享有比列宁的任何一个继承人都大的权威。布哈林在其全盛时期，曾在党、苏维埃和共产国际的许多机构中担任领导职务，其中包括俄共中央和政治局，苏维埃大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主席团，共产国际的中央机构（他于 1926 年接替季诺维也夫担任共产国际主席），共青团，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红色工会国际，红色教授协会，中央党校，马、恩、列研究院以及许多其他有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和教育方面的决策和行政部门。不仅如此，在整个 20 年代，在每一次党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上，他都是主要代表和发言人，并在会议形成决议和拟定正式声

明方面起着主导作用。担任《真理报》主编这个职务更进一步提高了他的权威和影响。除1918年的短暂中断外，他从1917到1929年一直担任这一职务。

然而，回顾起来，应当指出的是，虽然他在苏联和国际共产党统治集团内担当了某些最高职务，但是，布哈林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演变所起的最重大和最持久的影响，并不来自他对权力工具和权力标志的操纵，而是来自其思想本身的力量。布哈林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对他来说，共产主义的斗争，不仅要在街垒上进行，而且还要在人们的头脑中展开。他正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这后一种斗争任务上的。他有犀利的头脑（也许仅次于托洛茨基），其他任何党的领导人望尘莫及的惊人渊博的知识，文笔又极流畅，因此，党和非党人士都把他看作是他那个时代党内最有能力、最为多才多艺的思想家。除列宁外，他在1917年前后对于布尔什维克领导所面临的许多问题的看法，对党的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影响，要比任何其他人的影响都大。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家，布哈林在共产党世界中首屈一指。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独创性研究和重新阐述在他生前就已成为党的经典著作。此外，通过他在哲学、社会学、政治理论、心理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及教育等领域的著作，他还指导了全党努力去解决这些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打下一个马克思主义基础。最后，作为成百本书籍、小册子和文章的作者，无数次党、苏维埃和共产国际会议的经常的演讲者，以及其他许多专业和群众组织的经常参加者，他在党内，非党群众中以及苏联以外，不仅帮助形成了当代的布尔什维克思想，而且帮助传播和普及了这种思想。列宁在遗嘱中称布哈林为党内“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这一著名提法，几乎得到了整个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赞同。苏俄内外的观察家有理由称他为站在他那时代最前面的领导人和列宁的合法继承人。

本书所写的乃是布哈林生命的最后年代中所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在上述“生平介绍”中完全没有提及，而且很多详细材料对于研究布哈林的外国学者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

# 目 录

## 前 言

第 1 章	跨进新的十年 .....	1
第 2 章	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 .....	16
第 3 章	尼古拉·布哈林在 1931 至 1933 年间 ...	24
第 4 章	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	50
第 5 章	《消息报》主编布哈林 .....	56
第 6 章	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 .....	64
第 7 章	尼古拉·布哈林在 1934 年 12 月至 1936 年 2 月间 .....	84
第 8 章	在国外 .....	101
第 9 章	险象环生的 1936 年夏秋 .....	110
第 10 章	最后几周的自由 .....	122
第 11 章	调查 .....	130
第 12 章	审判 .....	139
代 跋	.....	155

## 第一章

# 跨进新的十年

1930年1月1日夜晩，克里姆林宫里斯大林的套间响起了敲门声。正同朋友们欢度新年的斯大林走过去为新的不速之客打开了门。尼古拉·布哈林、阿列克塞·李可夫和米哈依尔·托姆斯基三个人拿着酒瓶站在门前。他们是来和斯大林友好和解的。

这场同所谓右倾集团的短暂斗争，尽管时而也是相当激烈的，现在实际上已告结束：斯大林获得了胜利。对于斯大林来说，这场最初只限于政治局内部的斗争，在很多方面比同“左倾”反对派的那场斗争更加艰巨。布哈林坚持要继续并发展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的基本特点是列宁制定的。列宁曾写道，要在国内“认真地、长期地”推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必须成为党在象俄国这样落后的、农民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手段。这就是为什么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出来反对斯大林为对付富农而建议进一步采取的特别措施，他们反对强制性的集体化，反对工业建设中的巨大规模。事实上，他们反对的这些都是违背新经济政策的。没有人能预见到，斯大林的新路线将把党和国家引向何处，他的这一突如其来的、新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将带来什么和会有什么后果。

毫无疑问，1927年秋季出现、到1928年更形恶化的购粮

困难是极其严重的。这个问题的出现与1925年和1926年期间制定的经济政策的一系列错误有关，而尼古拉·布哈林是制定这一政策的积极参与者之一。国家定的粮食价格已被证明偏低。另一方面，过早地降低许多工业品价格和减少农业税，以及提高许多经济作物的固定价格，这些因素导致农村向国家自愿出售粮食的数量大幅度下降。斯大林提出的措施，特别是采取征用富农粮食的措施，使粮食的平衡和城市的供应均有一定好转。但是，这些措施遇到了富农、中农和党内以及苏维埃大部分工作人员的反对。反对意见还来自党内经济学家和预算专家。尼古拉·布哈林最初支持采取特别措施，但是不久，他认识到如果这一政策再继续下去，就会带来极大的危险。他建议放弃这项政策而寻求新的经济手段以度过危机。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和农业税，并增加农村所需商品的生产，就可解除压力。为了制止富农的破坏和保证城市的面包供应，布哈林建议暂时压缩向重工业建设的调拨，并从国外购买供应城市所必需的部分粮食。必须增加农村所需要的工业品生产，而根据布哈林的意见，其中有的要从国外进口。所有这些措施将有助于解决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所面临的危机，而无需诉诸暴力。农业和消费品生产的增长将有助于积累资金，而反过来将导致迅速恢复有计划地发展重工业。至于集体化的问题，布哈林坚持必须遵守五年计划中设想的稳步前进的方针。在布哈林看来，强迫推行集体化，在既缺乏最新技术和国家财政支援，又缺乏领导集体生产经验的情况下，建立成千上万个集体农庄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这样做非但不能提高农业生产，反而有可能导致其下降。

最初布哈林的建议得到了政治局大多数的支持。斯大林发现自己处于少数地位，便想尽办法争取时间。多年来他第

一次离开了他的书房，不去高加索度假，而前往西伯利亚。那里的剩余粮食多得惊人，但是收购上来的粮食却少得可怜。斯大林花了一些时间在新西伯利亚和巴尔瑙尔，参观了一些地区，并同那里的工人和农民进行交谈。归途中，他的情绪特别烦躁。他发现，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中，几乎没有什么人同意他的观点。这是斯大林最后一次离开城市，直到去世，他再也没有重访农村。现在斯大林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政治上进行勾心斗角，在这方面他是个行家。而承认错误则是不可思议的。布哈林和李可夫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多半还只限于在政治局内部进行争论，斯大林却利用了这一点，公开否认政治局内部存在任何分歧。在整个1928年，他只含糊地提到“来自右的”或“右倾”的危险。但是到了1928年后期，斯大林已经把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争取到自己一边。现在，斯大林在政治局中得到了多数的支持，在1929年1月的中央全会上对布哈林发动了突然袭击。他的发言如下：

同志们！不管多么令人痛心，也不得不确认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党内形成了由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组成的特殊的布哈林集团。过去党一点也不知道这个集团存在，因为布哈林分子对党严密地隐瞒了这种集团存在的事实。但是现在这已经是尽人皆知、有目共睹的了。从这个集团的声明中可以看出，它有自己的、和党的政策相对抗的特殊政纲。……

这个声明是不真实的，因为首先正是斯大林而不是布哈林竭尽全力向党隐瞒了存在着同政治局严重的意见分歧。斯大林对布哈林和与布哈林有相似观点的同事们态度的揭露更是错误的和不准确的。然而，斯大林对于是否能得到中央委

员会内部的普遍支持不很清楚，同时他也希望避免因公开这些难题而造成由党作全面判断的局面，所以他建议不发表1929年1—2月中央全会的细节。斯大林在那届全会上发言的某些摘要直到1949年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才第一次发表。

1929年1月至4月这一时期是布哈林派(及其政治路线)同斯大林派之间冲突的决定性阶段。这一冲突主要是以政治局内部展开剧烈交锋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例如那年1月30日和2月9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就是这样的。通过政治局印发范围有限的特别信件，党的积极分子了解到会议讨论的情况，其中对农村形势和党的上层集团的情况作了明显带有倾向性的介绍。

布哈林根本不是党内斗争的专家。但是，斯大林开始是从总的方面对富农分子和新经济政策发动进攻，同时继续寻求同惶惶不安的“左倾”反对派(当然不包括托洛茨基)进行接触。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恢复了党内的地位。不久前刚被贬到地方上的“左派”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开始返回莫斯科，并担任了负责工作，其中包括格奥尔基·皮达可夫、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狄克、斯米尔加、谢烈布里亚科夫和斯米尔诺夫。当时，布哈林试图与加米涅夫联系，讨论党内新形势，却被看成是企图建立另一个反党宗派，分裂党的步骤等等。

在此之前，1928年秋，布哈林在《真理报》发表了题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的文章，详细地提出无需进一步“革命”，而以新经济政策的现代化和发展来解决国内的经济困难。在这篇文章中，布哈林对限制富农活动，发展合作化和推行一项更加切合实际的价格政策表示赞同。他坚持计划经济的原则，

但是由于不可能预见到的各种偶然性，所以他强调在制定计划时千万别走极端。他论证了工业计划必须同农业发展相适应，并必须考虑到国家所拥有的实际资源。不可能以降低农业产量为代价来实现工业化；工业化的速度必须适当；必须高度优先提高生产率，同时降低成本。

此文一发表，斯大林就抑制自己不与布哈林展开争论。他甚至在一篇讲话中说布哈林提出了一系列“相当切实可行和合理的”理论问题。

1929年1月底，布哈林在纪念列宁逝世5周年集会上讲话。布哈林在题为《列宁的政治遗嘱》的讲话中，根据1921—1922年列宁的文章和讲话，详尽地阐述了列宁关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未来远景的观点。任何听了或读了这一讲话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出，斯大林新的政治路线远比布哈林所建议的政治路线要偏离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但是对斯大林的这种间接攻击实际证明很大程度上是不起作用的。

斯大林及其支持者以不同方式展开活动。他们动员所能动员的一切来反对布哈林。1915—1916年列宁与布哈林之间关于国家问题的理论分歧，从历史上被翻了出来。在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列宁与布哈林之间的分歧也同样被翻了出来，那时布哈林是“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首领。针对布哈林在1925—1927年期间的著作和讲话进行了吹毛求疵的指责。那时布哈林正在奠定新经济政策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使之与最新的形势合拍，并同全党一起反对“左倾”倾向。那时党正在探索一条无法预测的道路，因此，布哈林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一些不够准确或考虑不周设想，是很自然的。同样，甚至在1918—1920年间的列宁著作中也出现相当多的错误或考虑不周的设想。列宁随后公开承认过这些错误，并且还



提到将来各式各样的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布哈林在 1925—1927 年所坚持的路线不仅大体上是正确的，同时它也是当时党的领导所执行的正式路线。

布哈林在 1925—1926 年曾有过关于富农及城乡资产阶级分子作用的评论，并提出过“发家致富”的口号，但不久布哈林本人就予以勾销和纠正了，可是这些都遭到了特别粗暴的歪曲。布哈林确实对新经济政策发展时期城乡资产阶级分子的命运考虑很多。布哈林主张保留个体农民经济、主张发展合作化的初级阶段，这样就会逐步说服农民走向全面合作生产和自行走向社会主义，而这同列宁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布哈林认为这样的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不是一场瞬息即变的革命；列宁本人也再三指出，农民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需要整个历史时代，而与此同时富农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将继续得到发展。布哈林看到了这点，而没有考虑到它的危险性。布哈林曾预言，富农阶级的演变将逐渐沿着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进行，因为随着辅以国家信贷制度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随着合作化组织工作的加强，富农将不可避免地失去独立的、个体化发展的一切可能性。布哈林也确实曾谈到把富农的生产资料“纳入”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然而，他同时也讲到在扩大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富农分子的“异己本性”，也谈到甚至在乡镇和农村的富农分子同社会主义成分竞争时，当然地对他们进行限制和再教育的可能性。他深信，社会主义将始终在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每个领域中占统治地位。不用说，这仅仅是防范性的理论——毕竟，最可能的是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将沿着新经济政策的路线发展。

布哈林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观点在 1925 年出版的《通向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一书中得到了阐述。这本书是他从